

观察

全国特大城市中心罕见保存完整的史前聚落 新乐遗址几乎是唯一的

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

“新乐遗址到了，请从列车左侧车门下车……”

1月31日中午，沈阳地铁2号线的报站声如常响起。车门打开，从C口走出，沿街步行约300米，便抵达新乐遗址博物馆。这里不是远郊荒野，而是位于沈阳城区北部、毗邻主干道的“城市中心”。地面上车流往来，高楼林立；地表之下，却沉睡着7200年前沈阳先民的聚落遗存。



沈阳新乐遗址。



冬日的光影里，“新乐人”与今日的沈阳城在此相遇。

沈阳人的“老家”

博物馆第一展厅内，30余名观众正跟随资深志愿者高金锷的讲解，“回到”2000年前。

“新乐遗址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，新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，把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到7000多年前……”高金锷话音未落，已有观众低声感叹，“原来咱们现在住的地方，祖先那么早就生活在那儿了。这和那些藏在深山、荒野的遗址太不一样了。”

的确不一样。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看来，这正是新乐遗址极其珍贵却常被忽视的特质：“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心，能完整保存这样一座史前聚落遗址并对公众开放，在全国特大城市中几乎是唯一的，堪为史前文明与文物保护的奇迹。”

遗址坐落于沈阳北部浑河古道北岸的一处高台上。7000多年前，这里灌木丛生，水草丰茂，先民“择高地而居”，捕鱼、狩猎、采集并种植谷物，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，用以抵御严寒酷暑。“他们选择这里，是基于生存的智慧。而这片土地，历经数千年，依然适宜人居，所以城市也在这里生长起来。”辽宁大学教授张星德解释道。

1973年，因农田水利工程施工，这片沉睡数千年的遗址首次被发现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经过六次考古发掘，共清理出半地穴房址50座，出土文物3000余件。它像是深植于城市生长脉络中的古老根系，见证着从原始聚落到现代都市的漫长变迁。

房址或是“议事厅”

跟随高金锷，观众们从展厅移步至室外的遗址保护区。核心区域的2号房址门前，悬挂着一块“祖宗故居”牌匾。

“这是遗址发现的最大房址，也是出土文物最多的，这一座房址出土了500多件文物，其中的炭化木雕艺术品是最重要的一件。”高金锷举

起手机，展示2021年该文物首次公开展出时的照片。这件已炭化的木雕，图案似鸟似鹰。

“炭化木雕艺术品很可能是权杖，而木雕鸟可能是新乐部族的图腾。”新乐遗址博物馆原馆长陆海英说。炭化木雕艺术品的发现，提示着这一部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。如今，它的形象早已穿越时空，化身“太阳鸟”雕塑，成为这座城市最显著的文化地标之一，“这就是文明印记的现代表达，它把城市7000年的人类居住历史，与今天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城市联结在一起了。”

2号房址面积约96平方米，周围还有两座规模相当的大型房址，呈“品”字形分布，周边穿插中小型房址。考古学家推测，这里可能是当时先民集会、议事的公共空间。从房址规模和布局，可以想见当年部落的生活图景。陆海英估计，居住在此的氏族成员应在200人左右。

煤精来自哪儿

遗址不仅提供了远古生活的片段，也留

下了诸多谜题。

在博物馆第三展厅，30余件乌黑润泽的小物件摆放在柜中。它们是新乐遗址出土的300余件煤精制品的代表。“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，这是绝无仅有的发现。”张星德强调。这意味着中国人使用煤的历史，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。

但它们究竟用来做什么？货币？玩具？装饰？还是绘画工具？展板上列举了多种推测，没有定论。就连11岁的小志愿者柴博文也有自己的猜想：“我觉得，后来的铅笔可能就是从这种东西变来的。”

更令人困惑的是原料来源。科学检测显示，这些煤精与抚顺所产的煤极为相似。然而，抚顺距离此地近百公里。是“新乐人”的活动范围已经如此之广？还是通过交换所得？抑或是古浑河水从上游将煤块冲到了这里，被先民拾获加工？答案依然需要再探索。

同样成谜的还有“新乐人”的最终去向。2号房址内曾发现大量炭化木柱，表明此处可能毁于火灾并被遗弃。正是这场大火，让

部分有机质文物因炭化而侥幸留存。

“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多久？是历经数代，还是传承数十代？如今已无从考证。”陆海英指出，新乐遗址的三层文化层虽呈相互叠压的状态，却各自呈现出鲜明独有的特征，彼此间并无直接的传承脉络。因此，新乐先民离开的原因，是环境变化、资源枯竭而主动的部落迁徙？学界至今未能给出确切答案……

不只是“站名”

尽管谜题尚未解开，新乐遗址却始终以其存在，悄然参与并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。

它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，遗址的发现与保护，使所在区域的发展多了一层历史的考量；它的代表形象——太阳鸟，已成为城市视觉符号，出现在标志、宣传品乃至市民日常可见的雕塑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处深沉的文化提醒，告诉人们这座城市并非凭空而起，其脚下叠压着悠长深厚的文明根脉。

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言：“沈阳市有‘两宝’，一个是新乐遗址，一个是沈阳故宫。”但是，与故宫游人如织的景象相比，新乐遗址却稍显冷清。“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提到新乐遗址，还只是作为一个地名来记忆。”陆海英的话，点出了这座遗址面临的现实处境，它离人们很近，故事却似乎很远。

讲解临近尾声，高金锷对观众说：“希望更多沈阳人能走进来，不要只当它是一个地铁站名。它是我们的城市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，是我们共同的‘老家’。”

走出博物馆，复原的半地穴房址静立于冬日阳光下，不远处，城市街道车流不息，住宅楼宇轮廓清晰。

7000年时光，在此重叠。

“下一站，新乐遗址。”每一次地铁报站声响起，都像是一次对城市文明源头的轻声呼唤。



志愿者高金锷正为观众讲解新乐文化。

国宝AI了

中华初代“神鸟”

本报记者 孙明慧

猜猜看：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雕上刻着什么？

祥云？龙纹？

答案是——一只振翅欲飞的祥鸟！它来自7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身形修长，线条古拙。

它是原始部落的发簪？还是神秘武器？

考古学家认为——

它，很可能是一柄象征权力的权杖。当年，部落首领正是手握它，才能号令四方、执掌祭祀。

说到鸟图腾，总会想起庄子笔下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大鹏。在先民眼中，鸟是穿梭天地的使者、凝聚信仰的图腾。

后来北方民族对鸟的崇敬，或许正源于此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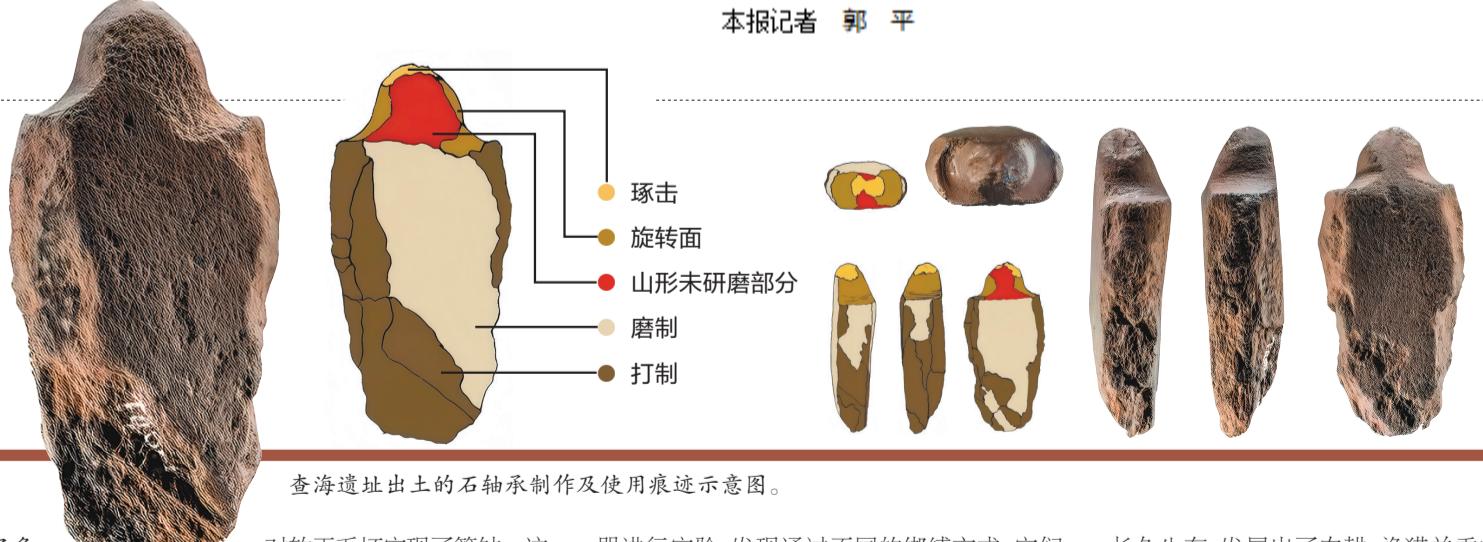
木雕鸟纹权杖。

本版图表 董昌秋

本报记者 郭 平

辽河先民8000年前造出石轴承

面对面



本报记者：您在辽宁地区参与和见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现。除了文明形态的“先行”，辽宁先民在工具与技术方面是否有独特的创造？

张星德：是的。辽宁地区的史前文化，尤其在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时期，出现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发明。其中，石轴承的发现非常关键。

查海遗址出土的石轴承，是用石块打制而成的。它的出现，将中国史前轮轴机械的起源明确追溯到了距今约8000年前。这不仅是辽宁先民的智慧结晶，也具有重大的科技史意义。

本报记者：石轴承具体是如何被证实并使用的？

张星德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曾进行过实验考古。他用天然河卵石模拟查海石轴承，与铲形器、器身对称打孔或束腰，便于绑缚木柄。辽宁大学的青年学者王闯曾复制这类石

器进行实验，发现通过不同的绑缚方式，它们既可用来挖土、锄地，也能作为斧类工具劈砍，一器多用，实用性强。这类器形在同期其他地区文化中较少见到。

此外，通过植物考古，我们在查海发现了处于野生向栽培过渡阶段的黍、粟颗粒，说明这里不仅是农业起源地之一，与之配套的农具也应运而生。而更早阶段，如小孤山遗址，已出现使用岫玉制作的玉质工具，葫芦岛杨家洼遗址也发现了早于查海的玉斧、玉球等，虽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，但已显示出本地治玉工艺的悠久渊源。

本报记者：除了石轴承，同一时期还有哪些工具方面的创造？

张星德：工具创造体现在多个方面。比如，在查海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打制的刮削器

与铲形器，器身对称打孔或束腰，便于绑缚木柄。辽宁大学的青年学者王闯曾复制这类石

长久生存，发展出了农耕、渔猎并重的混合经济模式。这种生存方式要求工具必须适应性强、一专多能。无论是可绑缚多种手柄的石器，还是用于提高玉器加工效率的石轴承，都体现出一种务实、灵活的创新思维——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，而是围绕着具体的生存和生产需求展开。

石轴承的意义尤其深远。它表明，早在8000年前，这里的先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手工操作，开始探索利用机械原理提高生产效率。这种技术意识，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。

本报记者：对于这些工具遗产，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与传承？

张星德：我常感慨，先民的智慧往往藏在这些看似朴实的石头与骨骼里。石轴承不仅是一件文物，它更是一个时代技术思维的物



香港中文大学实验考古木制辘轳与石质轴承结合轮轴机械。

证。它告诉我们，文明的前行，既离不开宏伟的仪式与社会组织，也离不开这些日常而关键的技术突破。

我想，对今天的启示在于，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走进古人的技术世界，理解他们如何利用有限条件解决实际问题。这种因地制宜、勇于创造的精神，是辽河流域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一个生动侧面。本文图片来自中国考古网